

總序

歷史地觀之，基督宗教有社會和思想兩個層面。前者指基督教會的形成及在諸民族社會中的傳入和生長過程；後者為基督信仰在神學、哲學、文學、藝術中的思想性歷史表達。基督宗教的社會層面和思想層面儘管相關聯，仍各具不同的形態。

基督教思想成形於公元最初三百年，其時有希臘語思想者和拉丁語思想者(希臘教父和拉丁教父)假希臘化哲學思想和羅馬哲學思想，表達對基督事件之認信，開基督思想之先河。在中世紀，基督思想在拉丁語文化中與古希臘思想再度融揉，形成歐洲中古思想之主流。近代以來，基督新教隨宗教改革而衍生，民族國家形成，基督思想遂與歐洲諸民族語言文化融揉，形成風貌各異之基督思想。俄羅斯則直承早期希臘語基督思想，形成獨特的俄語基督思想(東正教思想)。近百年來，隨肇始於歐洲之社會現代化過程，基督思想亦植入亞洲，產生漢語、韓語、日語之基督思想。

語文乃思想文化之容器，基督思想之品質超逾民族性，形態卻僂依於民族語言織體。故基督思想既具普世性，又具民族語文思想個性。基督思想歷近兩千年語程，迄今仍在諸民族文化言路中伸展，成為世界性文化

在一九九四年四月於耶魯大學召開了一次學術會議，後結集為另一本致送給帕利坎的榮譽紀念文集，題為《無疆界之群體：基督教普世主義文集》，⁷²此書可說是再一次標誌了帕氏以其涵蓋性與整合性之教義史進路，對基督教不同傳統的貢獻。最後，帕氏在其著作中，偶爾提及其他宗教的學說，而其唯一全面論述其他宗教之專書，則為他為美國每月書會撰寫的《尋索聖卷——我們與別人的》。⁷³

基督教教義史學與漢語神學之反思 帕利坎一生所歸屬與致力傳承之西方基督教教義史學，可以如何有助於我們反思基督教思想在中國的流佈，以及漢語神學的建構？

首先要探討的自然是在基督教教義體系在漢文化語境中傳承的問題。傳統的中國教會深受敬虔主義與反智主義的影響，將教義與教理等同教條主義，只談信仰之承擔，輕視信仰體系性之承傳。若按帕利坎之理解，教義絕非純然是信仰的確認與告白，還包括了信仰群體之思想、禮儀與實踐之各層面之整合。教義即為教會所信、所傳與所認之傳統。漢語神學應該採取此種全盤性、有機性與整合性之進路，來考察與研究基督教傳統在漢語文化語境中之各種形態。此包括歷時性之考察，如漢語景教文典，⁷⁴及明代之徐光啟、李之藻與楊廷筠之神學先驅；⁷⁵其次為共時性之考察，檢視基督教各部之教義如何

72. 《無疆界之群體：基督教普世主義文集》，帕利坎教授榮譽紀念文集，New York, 1996。

73. 帕氏，《尋索聖卷——我們與別人的》，New York, 1992。

74. 翁紹軍注釋，《漢語景教文典詮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此書為本研究所之早期項目。

75. 參劉小楓，《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道風：漢語神學學刊》，香港，1995 (2)，頁9及注2。

相遇與呈現於當代中國的各種思潮與思想形態中，如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共產主義與後共產主義。

不過，此種教義性的審查雖然始於基督教會之所信、所傳與所認，但卻絕不囿於傳統教會之範疇。正如帕氏所言，在當代多元文化的處境中，教義史日漸演變為神學史，二者之間的界線日益含混，教義之傳統與演變亦不再純以教會為主角，不同文化、思潮與社會運動之因素互相交織，形成一種正如諺語所言，教義與神學既為如斯重要之事，以致無法單純為教會之事務。換言之，教義史之整理與研寫，至終必然是歸屬於宏觀之精神文明史之一部分，而此種帕氏典範式的銳見，亦成為了漢語神學作為人文科學的重要基礎。任何在當代全球化與國內外漢文化語境中體系性之反思與建構，必然要立足於當代文化思潮之大脈絡中，由此而尋索基督教整體傳統的整體意義。

其次，漢語神學需要在反思教義論之同時，重新檢視傳統之觀念。從五四運動至當代中國之思想界，早已有無數思想人物提出其對傳統之批判與省思，從中體西用至全盤西化，及至近年中國思想界中提出有關反傳統與批判地承繼傳統之說，以及各方面對改良、改革與革命的文化反思，這些不同觀點的整合，即為當代中國文化與政治社經之傳統觀的探索。⁷⁶漢語神學雖然致力於基督教傳統之反思與傳承，但基督教傳統與中國文化傳統之間卻是存在着千絲萬縷的微妙關係，審視基督教傳統在西方文化與全球化處境中的進程，必然有助於對當代中國的反思。

正如其他傳統一般，基督教傳統亦為一元與多元之

76. 文化性之代表，參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1996。社會性與宗教社會理論性，參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香港，1996。

傳統，兼具了其內部分殊性(如改教運動中之路德、加爾文、慈運理與極端重洗派)，與外在多元化之現象(如基督舊教、新教、東正教)，從而合為龐大的基督宗教歷史傳統。但是按照帕氏之定義，神學既非教義，亦不等同整體之傳統，神學乃是對自身宗教之原典與聖卷，及由此衍生之信仰群體之所信、所傳與所認之教義之詮釋，而既為詮釋，必然與詮釋之對象產生距離化之關係，但神學一旦衍生成形，亦會與傳統融匯，產生整合濡化之關係。故此漢語神學之任務之一為對中國基督教傳統之詮釋，而此詮釋必須兼顧傳統之內外多元性。漢語神學既建基於人文科學之基礎，自然有別於純為教會自述與服務之教會性神學。然而不論是教會性神學或其他不同路線之教派性神學，均應成為一種真正華人教義學與教義史學的考察對象。⁷⁷

漢語神學自其發軔之初，便自然具備其歷史條件與思想形態。簡略而言，華人教會神學多重英美神學之淵源，而漢語神學多重歐陸思想之資源；漢語神學早期活動之空間似多為更正教神學之園地，但在建構之過程中卻平均地溯源於基督新、舊教與東正教之資源，兼及更正教之特洛爾奇、卜仁爾與莫爾特曼，⁷⁸天主教之拉納、巴爾塔薩與漢斯·昆及特雷西，⁷⁹以及東正教之布爾加科夫、別爾加耶夫與圖像神學。⁸⁰此種集三大基督教傳統之

77. 作為人文學科的漢語神學雖有別於教會神學，卻應涵括所有不同教派之神學現象於其當代神學類型之考察。帕利坎曾以其教義發展史觀來批判地考察盛極一時之美國基要派之神學現象，見帕氏，〈基要主義與／或正統信仰？如何理解基要主義之現象〉，《基要主義之現象》，Grand Rapids, 1990, 頁3-25。

78. 參《道風：漢語神學學刊》第一期論特洛爾奇與卜仁爾之專文，1994；第四期論莫爾特曼之專文，1996。

79. 參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之「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之研究系列中上述各人著作之譯著。

80. 參《道風：漢語神學學刊》第一、二期之專文，另參赫克，《俄羅斯的宗教》，高驊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4。

普世神學景觀，自然有別於傳統分庭抗禮之中國神學，但亦由此而將漢語神學提升至超越地域與教派之人文科學式的基督宗教神學。

最後，此種人文科學式的漢語神學必然地具備了普世的視野與胸襟。按帕利坎之結束語則為「我信唯一大公和使徒的聖教會」，⁸¹而此教會觀並非等同建制性之教會形態，乃是涵括一切匯集於歷史性基督教傳統之人物、思想、藝術、音樂與文化。換言之，漢語神學是溯源於基督教三大歷史傳統之神學運動，以整個人文科學的宏觀視野為遠象，致力於「以漢語文化的歷史的思想資源和社會經驗發展基督神學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漢語思想文化之風範的基督神學文化」。⁸²

81. 帕氏，《基督教傳統》，卷五，頁336。

82. 見《道風：漢語神學學刊》第一期，復刊號之〈復刊辭〉，香港，1994，頁9。